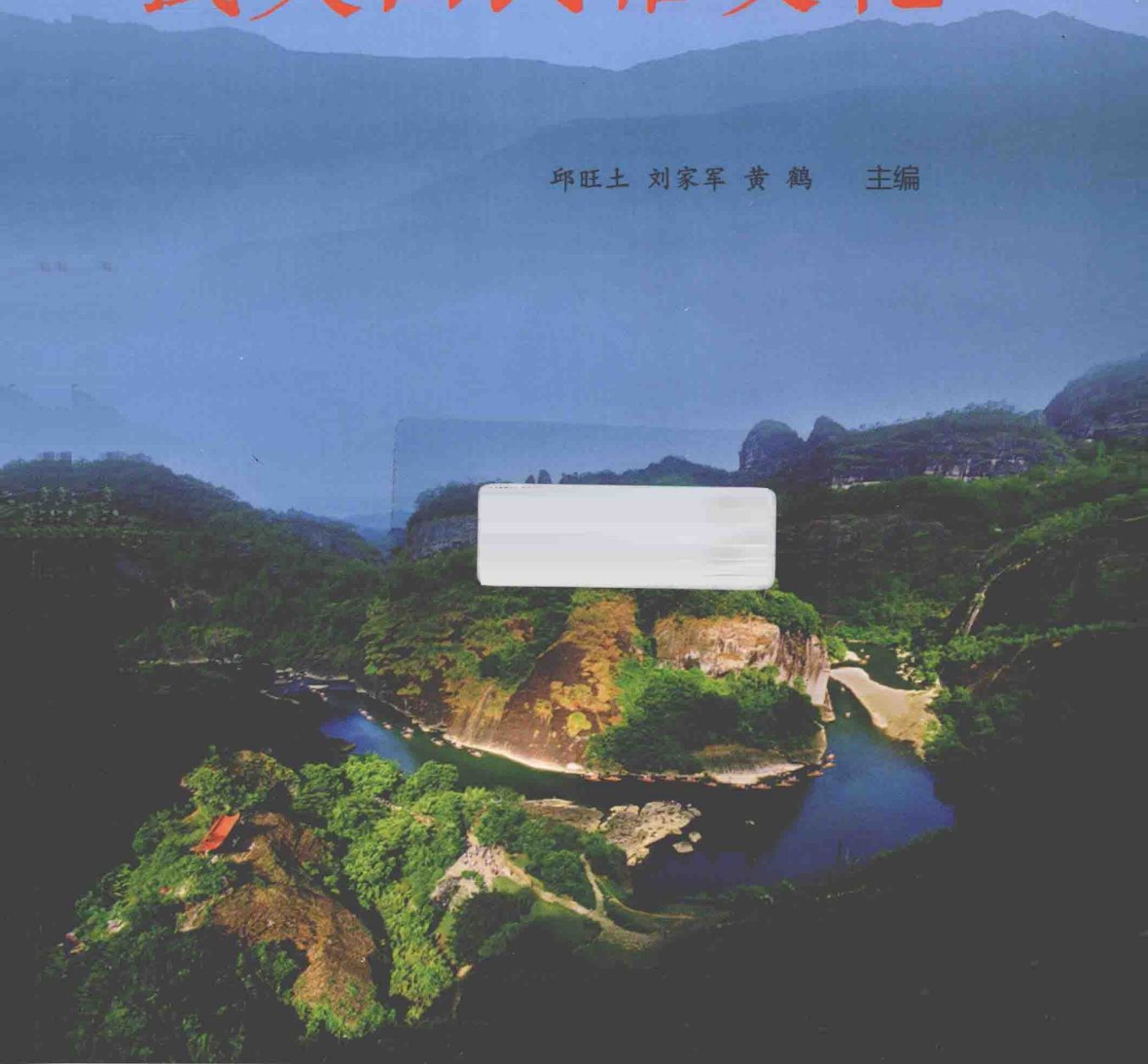


| 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与研究 | 第六辑 | 总主编 李晓红 |

厦 门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编
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中心

武夷山民俗文化

邱旺土 刘家军 黄鹤 主编



Wuyishan Shijie Wenhua Yichan
Jiance yu Yanjiu

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与研究

〔第六辑〕 总主编 李晓红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中心

编

武夷山民俗文化

邱旺土 刘家军 黄鹤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武夷山民俗文化/邱旺土,刘家军,黄鹤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12

(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与研究/李晓红主编)

ISBN 978-7-5615-4943-8

I. ①武… II. ①邱…②刘…③黄… III. ①武夷山-风俗习惯-研究 IV. ①K892. 4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2053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xmupress.com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6.5 插页:2

字数:360 千字 印数:1~1 500 册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武夷山民俗之监测报告

武夷山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黄 鹤/1
武夷山民俗采风调查综述	刘家军/10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及利用	
——以武夷山习俗文化为例	毛安琪/21
武夷山民俗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朱新屋/39
永续遗世的美好：世界遗产武夷山的保护和利用	钱 浪/52

武夷山口承及风俗类民俗

武夷山谚语文化考察	马 强/62
武夷山民间戏曲的主要形式及其民俗文化价值	谢姝婕/69
武夷山的社会组织民俗	
——以乡间的“社”为考察中心	蔡丹妮/80
武夷山的民间礼俗及《朱子家礼》	钟 华/93
闽北民间的岁时节令习俗文化	乐裕贤/106
武夷山的中元节	董乾坤/114
武夷山的传统婚俗	王心君/120
武夷山的民间信仰	曾 伟/134
武夷山民间医疗习俗	王昌雷/152
偶像的塑造：武夷山扣冰古佛信仰的兴起与演变	张锡臻/161



武夷山地区下梅等传统村落民间宗教的状况考察	王利兵/167
-----------------------------	---------

武夷山物质类民俗

武夷山的生产与居住民俗	殷秀云/175
武夷山下梅聚落空间的形成与传统民居	吴鲁薇/193
武夷山的宗族、祠堂与祭祖仪式	朱忠飞/200
武夷山民居雕刻艺术浅析	刘烨琳/211
武夷山饮食民俗漫谈	梅金鑫/220
浅谈水在武夷山信仰民俗中的地位	曾 伟 傅浩相/241
武夷山“吃文化”习俗意义初探	刘瑞雄/250



武夷山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黄 鹤*

1999年12月1日,武夷山自然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武夷山地处中国福建省西北部,总面积为999.75平方公里,根据区内资源的不同特性来划分,可以分为中部九曲溪生态、东部自然与文化景观以及城村闽越王城遗址等4个保护区。自然遗产中比较著名的有九曲溪、三十六峰、七十二洞、九十九岩和一百零八景等,文化遗产中比较著名的有闽越王城遗址、下梅村等古村落遗址和紫阳楼、兴贤书院等文化遗址,除此之外,还包括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诸如种类繁多的民俗事项。这些丰富多彩的名胜古迹与文化习俗均为福建省自然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本文将主要针对包括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文化类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等问题进行分析与阐述。

一、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 文化遗产

世界性的遗产保护运动,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规整的话语体系,《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是这一话语体系的重要体现。《公约》从三个角度对“文化遗产”进行了定义: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来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从历史、审美、民族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按照《公约》提供的标准,武夷山的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首先,文物层面。该层面主要以武夷精舍、叔圭精舍以及诸多摩崖石刻等为代表。武夷精舍又称紫阳书院、武夷书院、朱文公祠,位于隐屏峰下平林渡九曲溪畔,是朱熹著书立

* 黄鹤,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



说、倡道讲学之所。叔圭精舍位于武夷山五曲云窝,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钦差苏德與受命礼聘崇安籍乡贤江贇(字叔圭)入朝为官,但被江贇屡屡婉拒。为了表彰其高风亮节,钦差命县令为其建造了叔圭精舍。叔圭精舍石坊门内的一个形似蹲虎的巨石高达数十米,名曰伏虎岩。这是武夷山摩崖石刻荟萃的地方之一,朝代跨越宋、元、明、清四朝。

其次,建筑群层面。该层面主要以下梅村、城村、五夫镇等古村落为代表。下梅村位于武夷山市东部。清康熙、乾隆年间,下梅村曾是武夷山著名的茶叶集散地。当地保留了30多幢具有清代建筑特色的古民居。这些集砖雕、石雕、木雕艺术于一体的古民居建筑群,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丰厚的人文景观资源。城村,位于武夷山风景名胜区南20公里、闽越王城附近,是一个具有众多古迹的古村镇。五夫镇自古就有“邹鲁渊源”之称,是理学宗师朱熹的故乡,朱子理学的形成地,境内、遗址遗迹丰富,是武夷山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紫阳楼、兴贤书院和朱子巷的古民居已经成为著名的建筑群。

再次,遗址层面。该层面主要以闽越王城、遇林亭窑址等遗址为代表。闽越王城建于公元前202年,系闽越王无诸受封于汉高祖刘邦时营建的一座王城,是中国南方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多的重要考古遗址。遇林亭窑址,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古窑址之一。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武夷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涵盖了上述五种分类中的所有内容。例如武夷山的传说纷繁多样,像九曲溪的传说、玉女峰的传说、大红袍的传说等,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美妙的画卷。当地的宗教信仰以道教和佛教为主,二者均历史悠久,代表性建筑分别为武夷宫、天上宫和天心永乐禅寺、慧苑寺等。表演艺术主要有著名的“五夫龙鱼戏”,它是流传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五夫镇的一种传统民间文化表演活动,它通过灯舞的方式,表演了大鲤鱼不畏反派乌龙的压迫和阻碍,最终越过龙门,化身成龙的故事,寓意深远。当地的饮食体系极富有民间特色,例如五夫镇的文公菜、下梅村的打麻子粿,都是当地久负盛名的菜肴,它们不仅要讲究节令,还要讲究程序与火候。还有其他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吃,比如酸枣糕等。当地的一些社会风俗非常有趣,例如不孝子死后要变野猪,因此野猪在伦理体系中具有负面的意义;而在饮食体系中野猪却具有正面意义,主人常用野猪肉来款待贵客,于是野猪这一语词在不同的民俗语境中具有了不同的意义。武夷地区的手工业也很



有特色,古街两旁有不少竹篾店、弹棉花店、打铁店等。武夷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了当地独有的文化气息,是了解武夷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二、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

武夷山的文化类遗产为当地申遗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然而,如何对这些珍贵的遗产进行科学有效地保护,使之能够持续地发展与传承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一方面是文化类遗产资源的丰富,使得保护工作成了艰巨的任务甚至负担;另一方面文化遗产更多地存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这就使得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成为当务之急。这些难题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社会结构的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武夷山地区传统的农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肩扛手推的重体力活由拖拉机、收割机、摩托车等器械替代,农民接受外界信息的途径也由于电信、电缆、电视的介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加上道路的通畅,大量游客的涌入,这些都进一步促成了当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这种转化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时候,也逐渐改变了传统文化赖以系的社会基础,传统文化功能圈因此逐渐解体。



图1 城村古民居现状(张锡臻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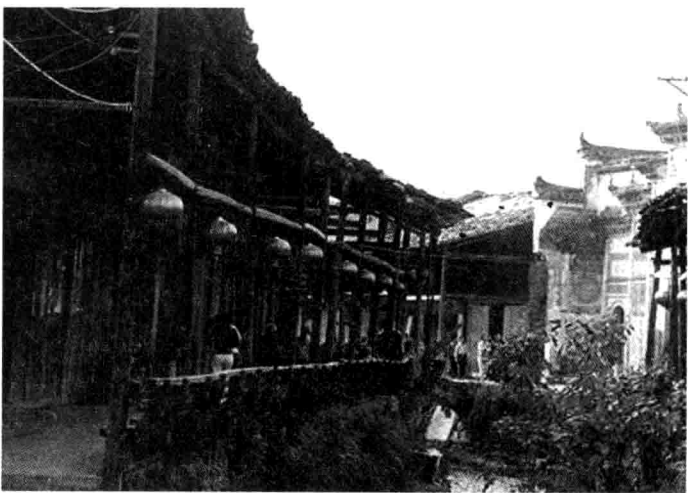


图2 下梅村古民居



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建筑等民俗事项上,例如城村就比较缺乏整体规划,古建筑与新建筑鳞次栉比,高低错落,再加上纵横交错的电缆电线,整个古村落的原生态环境被逐渐破坏,这就向我们敲响了警钟(见图1)。而同为武夷山境内的下梅村,却在古建筑的保护工作上做的卓有成效(见图2)。现代建筑被隔离在古村落之外,整个村子的古建筑保持了难得的一致性。这同下梅村的综合治理方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即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能以破坏珍贵文化遗产为代价。这两种保护现状的鲜明对比,一方面凸显了当地村镇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村这类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窘迫现状。另外,面对着经济缓慢发展与外面世界的诱惑,打工族的人数越来越多。除了村子里的青壮年,很多年轻女性也逐渐融入了进城务工的洪流。村子里劳动力和文化传承人的大量缺失,使得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越发步履维艰。

(二)发展的不平衡

城村这类古村落逐渐破落的现状凸显了遗产保护在欠发达地区必将遭遇的一个普遍难题,那就是保护遗产重要还是更好的生存重要?在经济发达地区,这并不是一个难题。经济的提升使得更好的生存已经不再是一个难题,此时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反而是文化层面上的问题,传统文化是防止我们在全球化浪潮中被空壳化、边缘化的最后一道壁垒,因此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就必须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具体表现在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溯源需要,因为这可以极大增强群体的凝聚力与认同感,并产生“根”的意识,借以明确区分我们和他们。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大到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小至武夷山境内的下梅村与城村等古村落,都面临着这个本不该成为二元对峙关系的两难问题。对于像城村这样的古村落,由于其较为封闭的特征、经济欠发达的现状以及欠缺正确的引导,使得村民普遍缺乏理性的保护意识。另外,盲目攀比之风的盛行,相对剥夺^①对村民心理的伤害也进一步促成了城村这类古村落保护的恶性循环。例如我们在采访村民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形(张锡臻和钱浪对村民的访谈):

张:这个房子要出租吗?我看你外面贴着招租启事。

村民:是。一千块。

钱:一个月一千?

村民:一年一千。

钱:这么少?

村民:(点头)

张:如果在外面挣到钱,会把这个老房子推倒,盖更漂亮的新房子吗?

^① 房子自然是有大有小的,如果附近的房子都和这间一样小的话,那它便足以实现一个住所的所有社会功能。但如果这座房子旁建起了一座宫殿,它就一下子变成了一间破草棚(卡尔·马克思)。我们把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时,我们的挫折感就会变得较为复杂。在电视普及的社会里,它把绝对剥夺(缺乏别人拥有的东西)的感觉转化为相对剥夺(被剥夺感)。



村民:(点头)会。

钱:会?为什么?

村民:别人能盖,我也能盖。

不过,即便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五夫镇和下梅村,虽然村镇政府对于古建筑的保护比较用心,但是就村民自身来说,仍然缺乏自觉理性的保护意识,推倒老房子的想法仍时有萌芽。这均凸显了发展经济是武夷古村落村民最为现实也最为迫切的诉求。在这样的语境下,发展很容易被单一地理解为尽快脱贫,而经济因素也因此会成为社会上的主导力量,其造成的结果或者是对文化遗产进行超载开发,或者是对文化遗产进行商业利用,而所有这些行为都难免会在保护的口号下行破坏之实。这个怪圈不仅在武夷山的古村落中存在,在全国大部分省市中都普遍存在,尤其在那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更是弊端凸显。那么,当更好地保护与更好地生存被摆上天平的两端,到底孰轻孰重呢?

(三)自然环境的问题

作为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武夷山,文化以自然为依托,自然以文化求发展,自然遗产与文化类遗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武夷山丰富的自然遗产却在遭受着不同程度上的破坏,这就给休戚与共的文化类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作为武夷地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岩茶文化久负盛名。1998年8月18日,第五届武夷岩茶节上产自“茶王”大红袍母树上的20克茶叶卖到了15.68万元的高价。暴利催生了商业需求,虽然目前市场上所卖的仅为人工繁殖的二代产品,但是借着“茶王”大红袍的声势,岩茶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提升空间。而“茶中精品数武夷,武夷佳品数天心(景区内天心村),天心佳品数三坑(章堂涧、牛栏坑、九龙窠三条峡谷)”^①使得景区内的土地寸土寸金。虽然,1982年编制的武夷山风景区总体规划提出“要进一步解决好武夷山林、茶矛盾。茶园面积不应再扩大,主要景区、景点和游览线路上的低产茶园应尽快退茶还林,其他的旧茶园应提高单产和质量”。但是近三十年来,毁林种茶的现象仍然持续发生,一些青山甚至由此变成了“秃顶”。茶地面积的扩大不仅破坏了武夷山地区的森林植被,还影响了景区的生态系统平衡。根据资料记载,景区开发旅游之前(1979年)的茶地面积为3458亩(见《武夷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资料),景区开发旅游后茶地面积逐年上升,至2005年,茶地面积为16034.4亩,增幅达363.69%。^②除了茶叶,一些著名建筑的扩建也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影响,例如2007年永乐禅寺扩建工程对林地植物和植被的破坏,这不仅包括挖山形成边坡导致植被退化、影响林地植被演替进程,还造成了整体景观的支离破碎。^③森林植被的减少,直接影响水的储存量。再加上九曲溪沿岸大量生活污水、人畜粪

①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编:《武夷山之旅》,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83页。

②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中心:《2006年武夷山风景区茶地监测报告》,2006年,第1页。

③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永乐禅寺扩建工程对林地植物和植被的影响》,2007年,第1~3页。



便以及残存化学肥料农药的注入,均导致九曲溪周围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地表水环境已由Ⅰ类水标准降至Ⅱ类水标准。^①生态环境的恶化,必然会导致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的萎缩,而旅游产业是武夷山地区重要的经济支柱,也是修缮和维护文化类遗产的必要前提与经济基础。因此,积极保护自然环境,避免让武夷山的遗产保护堕入恶性循环,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三、静态保护与活态传承

我们的本意是要考察武夷山地区传统的民间文化,但是在考察过程中看到的却是一种新的、被重新建构着的民间文化的再生产过程。正如萨林斯所言,“文化在我们探寻如何去理解它时随之消失,接着又会以我们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现出来。”^②这一方面根源于文化类遗产自身遭遇的困境;另一方面因为文化类遗产在与当地的政治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后,部分文化类遗产转化成了人文资源。因此,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武夷山的传统文化,而是各种力量对其施加作用后,不断发生着变化的民间文化。在各种“力”的作用下,武夷地区文化类遗产的变化逐渐呈现出了多元分化——发展、停滞与衰落并存。那么,应该如何把握好这种改变的进程,如何把握好文化类遗产的内在活力,如何让其当代社会中得到新的发展,是目前保护工作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这不仅是武夷山地区存在的问题,全中国的文化类遗产保护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相应的,学术界也存在着“静态保护”与“动态保护”两种观点。静态保护强调的是文化类遗产的“原生态性”,关注的是其与原始语境之间的黏附关系;动态保护强调的是文化类遗产的“活态传承”,关注的是其与不断变迁的时代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对于该问题,笔者认为在现实语境下,“静态保护”比较适合文化类遗产里提到的前三种类型,如文物、建筑群和遗址,静态保护有助于保证文化遗产的“原真性”;而“动态保护”则更适合于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求,因为“倘若像保护文物那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凝固式、化石式、标本式的保护,保护也就成了一种消灭。”^③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动态保护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因为这难免会沦为“遗产制造”。由此,在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由费孝通先生率先提出,主要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如何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认识我们的历史文化,以确立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增强我们民族文化的认

① 武夷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系,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武夷山九曲溪水环境质量评价报告》,2008年,第1页。

②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1页。

③ 刘志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类学透视》,《民族艺术》,2009年7月,第29页。



同感;另一个方面就是如何更新我们的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化,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并在这里找到自己文化的位置与坐标。^①文化自觉谈到了现代文化转型时期面临的两大困境,一是如何认识,这个认识的过程建立在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二是如何更新,文化不变化是不可能的,唯有顺应时代潮流加以整合变化才是目前所需。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文化持续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充分肯定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展文化。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自觉不仅包括群众层面,还包括政府层面。在提升民众文化自觉的同时,政府也要出台相关的奖励政策,通过媒体的宣传形成全社会的价值认知。政府还可以帮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知识产权申报,有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权利及传承人的知识产权权利,带领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肯定与发展文化类遗产的行动中来。但必须注意的是,政府的职能不能越界,不能剥夺民众的自主性,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才能避免政府过多干预和群众的盲目开发对文化类遗产造成的破坏。

(二)将遗产变资源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是遗产变资源的核心理念。1987年起陆续修建的仿宋古街为遗产保护政策中的“遗产变资源”这一问题打开了思路。这条古街是集宋代建筑风格与南方特色于一体的建筑组群,全长200余米,由彭祖山房、仙姿馆、乡土寨、岩顶香、六六峰、翠云小肆等风格各异的单体建筑组成。^②199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家傅熹年对这一设计大加褒扬,认为其与周围环境的结合如此巧妙、浑然一体。这均源于建筑师杨廷宝教授提出的五项设计原则——“宜土不宜洋、宜低不宜高、宜藏不宜露、宜散不宜聚、宜淡不宜浓”。^③仿宋古街的成功案例,为武夷山文化遗产的保护开辟了新的视角,即凸显指导原则的重要性、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打破旧有模式灵活再造。^④这一思路和日本文化财的保护理念非常相近。日本一直提倡保护文化财,就是要将文化遗产活用,让其成为重振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的一种资源。其目的是将文化传统活态地保留在社区之中,并在此基础上再造农村社区新生活。这不仅是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更是对旧有模式的灵活再造。这种“遗产到资源”的核心理念指导我们对文化类遗产不仅要保护,还应该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而这种创新毋宁说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保护。

另外,在创新形式方面也需要有所改进,对武夷地区的文化类遗产进行影像化记录、分析与阐释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这和当代社会文化的转型、视觉文化逐渐占据了文化形态的主流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种“世界图像时代”,方便快捷的影像处理拥有无可比

① 方李莉:《“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民族艺术》2007年第1期,第81页。

② 武夷山风景名胜區管理委员会编:《武夷山之旅》,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③ 武夷山风景名胜區管理委员会编:《武夷山之旅》,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第130页。

④ 仿宋古街的案例不是为了让武夷山地区进行遗产制造。而是要以此论证对现有资源的整合开发利用、打破旧有模式灵活再造的重要性,拓宽遗产保护者的思路。



拟的优越性与话语权。影像不仅建构现实与历史,还建构人们的认知方式,使人们满足于去享受影像提供的信息,并自愿接受影像符号的引导。因此,对影像的把握不仅可以记录文化类遗产,还关系到影像话语权的分配问题,这对武夷山地区的文化遗产乃至整体形象的文化深描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韩蕾的《中国新世纪:民膳汤包》就很好地运用了影像化手法对民膳汤包这一民俗事项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如果仅就汤包本身来说,无论怎样拍摄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因为汤包的个体形状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韩蕾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物”的探索上,而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将汤包与制作者和周围的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在“动态保护”的层面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另外,主角陈士荣虽然已入古稀之年,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却很新,他用现代的理念来打理传统的小吃,不仅把传统小吃发展起来,还带动了一方经济。陈士荣的创新经营和韩蕾的创新拍摄,发挥出了 $1+1>2$ 的效果,民膳汤包不仅在坊间广为人知,还让国外的观众见识到了这一中华美食。这种蕴含着丰富文化底蕴的影像化表达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影像传播对被拍摄物的宣传。由此可见,影像传媒等先进技术的发展,为文化类遗产的保护与宣传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途径。它不仅能够克服遗产保护和传播过程中场域的束缚、传承渠道不畅,传播覆盖面狭窄等问题,还能让文化类遗产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独特性得以创造性的保护,并且在传承的同时强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的活态性与流变性。武夷山地区文化类遗产的保护大可以遵循这一形式,这对于遗产的保护、发展和传承都有着极大的正面意义。

(三)从积极保护到活态传承

由于文化类遗产既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又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就决定了对它的保护不能仅仅停留在积极层面上,而是要有针对性的保护方针。尤其是对于民俗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要积极地保护,更要保持一种活态的传承,使其能够生生不息地发展下去。然而,在现实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理念,却一直是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之间的最大问题,因为植根于传统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传统文化,很可能会以一种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形态存在着。这就使得秉承活态传承这一理念的传承人机制的贯彻困难重重。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此加以改进:首先,必须要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及待遇。其次,许多文化活动本身就是推广文化遗产的平台,政府要加以重视并给予积极地引导。

归根结底,在当前的文化类遗产保护工作中,传承发展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传承发展的核心是围绕传承人及其传习活动建立起来的传承保护体系。可以说,没有传承人及传承活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将形同虚设,只有保护好了传承人及传承体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良好的延续与发展。玉溪师范学院在继承这一理念的基础上进行了发展,由他们牵头建立的“湄公河次区域民族民间文化传习馆”,拓展了活态传承原有的单点、单线的传习模式。他们由点到面,由线到网络,将整个区域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升为大学课程的“本土化”目标,真正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共享,为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与精神启迪。玉溪的经验颇值得武夷地区借鉴,武夷地区有着丰富



的文化遗产资源,传习馆模式非常便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并有效地在传承中加以发展。这不仅有助于当地文化的保护,更有助于让武夷地区亮出自己独特的名片,进一步促进当地文化事业的良性循环。

结 语

在全球化想象共同体下,人类的许多价值都在趋同,而传统文化可能是保持人们文化认同感的最后一道壁垒。但是,维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类遗产,并不是说要以一种简单的排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来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而是要在活态的保护和传承的同时防止全球化浪潮造成的民族文化价值的空壳化与商业化。这就需要我们时时秉承费孝通先生所言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保护与发展的同时唤起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对传统文化进行再理解与再评估。这种理念有助于保护者在与主流普适性知识的不断比较和整合中,能够选择出最适合地方文化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地方文化的异军突起以及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

参考文献

- 武夷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编:《武夷山之旅》,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年。
-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武夷山世界遗产监测中心:《2006年武夷山风景区茶地监测报告》,2006年。
- 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永乐禅寺扩建工程对林地植物和植被的影响》,2007年。
- 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三联书店,2002年。
- 刘志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人类学透视》,《民族艺术》,2009年7月。
- 方李莉:《“文化自觉”与“全球化”发展》,《民族艺术》2007年第1期。



武夷山民俗采风调查综述

刘家军*

人类社会的民间习俗都包含有一定的地域文化内涵或民族性格,因此,“入乡先问俗”,广大的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民俗形式及活动既是一种文化预习,又是对族群最后总结定义的重要参照。“无论文化如何变迁,传统中优秀的东西一定会得到保留,而其糟粕必然被抛弃,无论是岁时节日等风俗还是家庭建构、宗教信仰等文化的其他内容,都一样受到选择,接受历史的检验,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①武夷山的许多民俗文化遗产至今,就必然蕴含着中原的根脉、历史的影子、地域的文化及民族的性格,非常值得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加以研讨、总结、传承。



图1 厦门大学武夷山民俗采风调查小组在闽粤王城遗址

在武夷山景区管委会及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分别由黄鹤老师、刘家

* 刘家军,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副教授。

① 福建省民俗学会:《闽台岁时节日习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页。



军老师带队,先后与2010年下半年与2011年上半年分两次赴武夷山有关田野点,对武夷山当地民俗做了典型性但又有民族志方法的调查,田野点主要有城村、曹墩、下梅村、五夫镇、朱子巷、林亭窑址、天上宫、闽粤王城、“双遗产”景区等古村落及重要文化遗存区。一系列的入户调查和文化苦旅可以说是对武夷山民俗“传承”与“特色”的一次很好的学习与理解,“为有源头活水来”,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一些管窥与思忖。

一、习俗溯源中的中原根脉与古越文化

习俗属于人类民间文化的范畴,而文化最早是一个外来词,来源于拉丁语,英文是culture,原意为:耕耘、耕作。文化的概念国内外很早就有争论,广义的文化一般是指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①但文化的功用古今中外都非常认可,都把文化看成是维系一个民族统一团结的重要支柱。著名史学家朱崇如说:“我们谈起了世界几大文明古国,有七大文明古国都有断代,而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没有断代?很重要的一个东西,靠文化。”^②一个地域能形成真正的“文化”名片,决非一日之功,这是世人皆认的共识。人类创造了文化,而文化反过来也创造了人类。武夷山以其丹霞地貌的无比奇秀甲于东南。“千百年来北方移民不断迁居福建并取得各自的生存空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家族和乡族观念。……福建民间各家族也十分重视家族神灵的塑造与崇拜”^③,武夷山民俗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八闽移民文化及习俗的一个缩影。

武夷山习俗文化源远流长,但其传承根本必然是中原的炎黄传统文化,其形成也类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原移民带来了汉民族传统习俗,又不断融进古越族地方习俗以及不同地域、村落方言文化等,构成了各地不同的习俗文化,而且有着更加丰富、独特的文化内涵。

武夷山习俗文化之渊薮,考古界早就有所明晰,比如在九曲溪岸边断崖上的悬棺经碳14测定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当地先人的遗迹已经接到了史前时代。根据有关考古史料记载,武夷山早在新石器时代,古越族就在这里创造了令现代人惊叹的架壑船、虹桥板等千古奇观。笔者参与的一次厦门大学武夷山考古实践活动中,曾在深山的草丛里寻到悬棺里掉下来的商周时期古陶碎片。自周至秦汉,就开始有黄河流域的“分封”贵族及战乱移民来到武夷山。城村闽越汉王城那规模宏大的殿堂井市、冶炼遗址的发掘,都曾引发史学界对福建汉代文化的热烈争论,总忍不住让人思考历史上的“可以立国”之根基和人气如何在这偏远蛮荒之地最终促成。到了南宋,除了大批战乱移民到武夷山之外,以朱熹

① 徐进功:《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文化融合与冲突》,厦大党委《建党85周年论文集》,第184页。

② 陈宏:《解读台湾问题》,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02页。

③ 陈支平:《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页。



为代表的一批理学家开始在此结庐讲学、聚徒传道,又把福建推到“执全国学术之牛耳”的地位,也深深地影响着当地的文化与习俗。直至元明清以来,达宦名流、文人骚客更是足迹绵绵,为后人留下丰富的人文景观。“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血统如何,而在于文化如何。”^①

武夷山民俗文化是一种厚重的积累。“民风民俗可以说是祖国民间文化中的一部分财富,闪闪发光,对于爱好研究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人,具有无限的吸引力”^②,武夷山的节日习俗成为了解璀璨中华文化和福建民俗的重要视角。在当今国家重视文化大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继承和弘扬促民生的习俗文化,对促进社会和谐、提高人文素养、促进“海西”建设等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习俗嬗变中的朱子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之上,都与杰出人物的个人作用密切相关。^③

闽北文化积淀深厚,是福建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和闽越文化的摇篮,被誉为“闽邦邹鲁”和“道南理窟”。历史上曾出了 2000 多位进士和 17 位宰相,如李纲、真德秀、杨荣等。历史文化名人如宋慈、辛弃疾、陆游、蔡襄、杨时、柳永、严羽等都曾在闽北留下足迹。

众所周知,蜚声国内外的南宋朱子学(也称之为闽学)发源地就是武夷山,该学派以深邃的道德智慧成为整个华夏大地元明清三代长达 7 个多世纪的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主流意识。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曾言:“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



图 2 调查队成员入户调查民俗文化

① 黎东方:《细说秦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② 厦门市思明区文艺联谊会:《闽台民俗风情》,鹭江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容肇祖序言,第 1 页。

③ 沃兴华:《中国书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8 页。